

劉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第

17

卷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劉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時期的反思 2009—2016年)

第

17

卷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劉國光

目 录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扩大内需问题的一些思考

——2009年2月7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顾问会上的发言
(2009年2月7日) 1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
(2009年3月31日) 8

共和国60周年感言四则 (2009年) 14

感言之一：前30年和后30年 14

感言之二：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7

感言之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 23

感言之四：也谈“改革开放” 30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的计划与市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建 (2009年) 37

一个思想解放的良好果实

——《权力结构论》序 (2009年) 52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磨砺和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21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总序
(2009年12月) 57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思路

(2010年3月9日) 61

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2010年4月在苏州召开的“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颁发会的发言 (2010年4月) 66

关于“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几点看法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的讲演 (2010年6月15日) 72

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困难

(2010年) 79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宏观调控

(2010年) 84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

(2010年) 99

“十二五”规划编制前夕谈加强国家计划的导向作用

——2010年4月28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0年4月28日) 114

计划性和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根本性区别

(2010年) 120

如何认识和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0年10月15日) 127

五中全会公报和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两点体会

——2010年11月6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上的发言 (2010年11月6日) 133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2010年12月) 139

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阵地

——读陈奎元同志2011年3月16日《讲话》随感 （2011年3月16日） 159

发展流通产业要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并用

（2011年） 164

首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奖答辞

（2011年5月28日） 169

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

——山东电视台采访刘国光纪要 （2011年） 175

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

——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2011年） 187

深化对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2011年6月） 191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1年） 196

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

——专访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国光 （2011年8月） 210

关于国富、民富和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些思考

（2011年） 213

为何“共同富裕”推进艰难

（2011年） 223

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才能制止两极分化

——2011年9月16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五届高层论坛”讲话 （2011年9月16日） 225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1届年会讲话

（2011年9月17日） 232

新形势下深刻认识和主动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优势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
光 (2011年) 237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石

——《共同理想的基石——国有企业若干重大问题评论》一
书的“前言” (2012年1月) 250

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死路一条

(2012年3月24日、2012年4月12日) 257

当前改革要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三个关键性问题

(2012年) 26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纪念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出20周年 (2012年9月) 268

把分好“蛋糕”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2012年10月) 273

重视发展集体经济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六届高层论坛上的致辞
(2012年) 278

随笔代序：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2013年) 284

“十八大”后再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警惕以“市场化为名”推行“私有化之实”的倾向
(2013年4月20日) 289

警惕以错误观点歪曲我国经济改革方向

(2013年) 296

对“社会透视——马克思主义视角”青年学术沙龙的寄语

(2013年) 299

九十感恩

(2013年11月26日) 301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成立30周年纪念会暨第15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

(2013年12月8日) 303

从经济领域中意识形态斗争谈到改革方向及其他

(2013年12月) 305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2014年4月29日) 314

资本主义危机重重,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

——2014年10月13日“第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讲话 (2014年10月13日) 318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

(2015年) 323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问题

——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办公室调研访谈的函 (2016年4月12日) 336

两个不同经济规律的斗争与消长

——致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函 (2016年5月14日) 344

刘国光经济学年谱 346

刘国光简历 384

刘国光编著目录 386

《刘国光经济论著全集》总目录 389

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扩大 内需问题的一些思考*

——2009年2月7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会长顾问会上的发言
(2009年2月7日)

去年4月13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顾问会上，讨论经济形势，当时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双防”，我提出宏观调控近两三年的任务，把经济增长由2007年的11.9%逐步回调到潜在增长率8%~9%，把物价由当时的7%~8%逐步调整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正3%以下，负2%以上。（详见《关于近期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点意见》，《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5月刊）

没有想到经济形势变化很快，只经过八九个月，GDP增速就由2007年的13%降为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到同比增长6.8%。物价也很快地从2008年2月份同比上涨8.7%，落到2009年1月同比上涨1%。

我想主要原因是没有正确估计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去年9月美国经济急转直下，影响我国外贸猛降，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导致工业和投资下降，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前期宏观调控采取适度从紧政策，从国内周期运行来看当时还是必要的，对稳定经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是引起经济急剧

* 原载《中国经济报告》2009年第2期。

下降的主要因素。适应经济变化，宏观政策调整为积极的和比较宽松的，也是及时必要的。

去年经济总的形势，与世界各国相比，9%的GDP增长速度可以说还是“较快发展”，但经济增速和物价指数降的幅度都很大。冷静地说不是平稳而是大落。这是前期大起的自然反应，毋庸讳言。但是与世界美欧日等经济体比，还可以说是“相对平稳”，一枝独秀。

经济下行虽然急了一些，但还是符合我们宏观调控大方向的。我们就是要把超过资源能源环境和人民大众承受能力的过高速增长降到潜在的增长速度，把明显的通胀率降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这样降下来，才有调整失去平衡的结构的空间，才有调整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余地。

今年的经济走势，中外有多种预测。2009年GDP的年速，预测高到9%~10%的也有，低到5%~6%的也有。多数人认同保8%的目标。今后的走势，是L，是U，还是V，有不同看法。企望出现V形走势，是否探底以后重新起飞再上高速度？那结果是重蹈资源能源环境承受不了，积累消费比例失调的局面。所以V形走势并不一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今后的经济走势，看来如果没有积极的和比较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按照钟摆摆动的原理，以潜在增长率为轴点，GDP的年增率将从2007年的13%的高度，下滑到潜在增长率8%~9%，达到年度4%~5%或更低一点，才能探底。但是有了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和支持，可以弥补一部分出口和投资的下降，探底就可以缓于钟摆的自然摆动，在略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在6%~8%之间达到谷底。探底以后，情况怎样呢？最好是不要出现V形走势，重新起飞向过热发展。最好出现的是L形走势，但是这个L形的底部横线要略微上翘，紧贴围绕潜在增长率8%~9%水平的附近，上下波动。如果达到这样的调控结果，我



们就能争取到从容地调整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时间和空间。能不能做到，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同时要靠国家计划的调控。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结构调整任务很繁重。当前形势逼迫我们非做不可的是外需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一个像我国这样多人口的大国，发展经济靠2/3的外贸依存度，36%的出口依存度来支撑，是十分不安全的，是不能持续的，这次危机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转向内需为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大家一致的共识。

但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又应该是哪个为主？

这些年，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固定资产投资率已从2000年的35.3%上升为2007年的42.3%，最终消费从62.3%下降为48.8%，其中居民消费从46.4%下降为35.4%，政府消费从15.9%下降为13.4%。这种趋势也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大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

那么我们这次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重大措施中，近两年4万亿元的中央为主导的投资计划，资金的投向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站、电网等基础设施，而与民生消费有关的项目虽然名目不少，但不占主要比例。而2009年全国的20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比2008年继续增长20%，其占GDP的比重比上年又有上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延续投资与消费比例偏颇，从而带来供给与需求的进一步失衡。在扩大内需中，投资需求的扩大是比较容易的，许多地区都在追求“大干快上”。但是更需要我们操心的是消费需求的比例上不去。如果消费比上不去，就是说

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那内需问题的解决仍是困难的。

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有许多角度、侧面、途径，如就业、社保、税收减免、市场营销等，各方面都在研究思路、对策，都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还缺少考虑。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 $V:M$ 的关系，最终分解为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若干年来， $V:M$ 的变动趋势很明显，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资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关系是国家、企业收入比重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比如1997—2007年，我国GDP增长234%，财政收入增长490%，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67%和98%。2007年江苏省一个全国最好的电器工厂调查，这个企业年上缴税收两个多亿元，工资支出只7000万元，企业净利润两个亿元。这种分配关系，显然不利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当然，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转化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但这部分服务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这几年也是有下降的。

与上述现象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在居民收入部分，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快，表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30年来已从0.29上升到近年的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这尤其不利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实现。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然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这样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

所以要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一条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户的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指出，有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公共产品供应不均、财税再分配调



节落后以及腐败等。所以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时，要从多方面入手。人们往往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仅仅依靠财税再分配是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决定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是人们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即所有制的差别。这连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面所言的一系列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跟私人资本财富积累暴富演进的过程，是不是有关？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不但要从财税再分配和其他途径来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直面这一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结论就是：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就必须增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且缩小居民收入中的贫富差距，同时扩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要根本缩小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宪法原则。

附文：

不宜期望中国出现V和U型走势*

今年2月7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和顾问会上，我对今后我国经济走向，会出现一种什么形式，表示了不赞同V和U，而主张L形走势的意见，但L形底部横线，将是从目前6%或更低增长率的低谷，略微上翘，紧贴围绕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7%~8%水平线附近，上下波动。我坚持这个看法。

这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卷进去，固然是不幸，但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是好事。它提前将我国从高速猛进的快跑急冲中拉回来，符合我国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中央政府制定的“十五”规划增长率就是7%，“十一五”规划增长率就是7.5%。10%以上的增长，不是国家的预期。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把超过我国资源、环境和人民大众承受能力的过高速增长，降到合理的增长速度，以获得调整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的空间，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与集约、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余地。人们预测或设想V形或U形走势，无非是表达了一种期望，就是经济重新由低速走向高速。V和U的区别，只在于曲线底部的时间长短。两个曲线的两端都持平，意在复苏繁荣之后，达到危机萧条前的高速顶峰。这种期望的不现实之处，就是它势必使我国的发展方式继续停留在依赖投资和外需拉动，经济结构继续停留在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增长速度与资源环境严重失衡的状态。而事实已经证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而不依靠内部最终消费需求，是不能长期持续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保持国民经济



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只有在合理的增长速度条件下，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以必要的空间和余地。

我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不宜再追求高速，而要以潜在增长速度为目标。就目前的条件来说，我国潜在增长速度为7%~8%，这在中国是一个“中速”，但在世界却是一个“高速”。我们应当珍惜这个速度。不要再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为正常现象和实际的追求目标。

要做到这点，在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上，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也不能完全靠计划调节，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强调全国一盘棋，中央和地方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是时候了。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

(2009年3月31日)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我们不能仅仅从体制运作层面来寻找危机的原因，还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层面，寻找它的深刻根源。这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但本质上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这次生产过剩的特点，即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了发达国家自身一些产品，如房屋、汽车等生产过剩外，还包括流通领域各种金融产品的过剩，形成虚假的购买力，刺激了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制的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

社会主义经济体受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的目的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矛

* 本文是作者2009年3月31日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首都经济学家论坛、教育部社科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经济危机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盾，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那时候苏联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不少，主要是以资源换取装备和技术，利用这个来进行五年计划的建设，蓬蓬勃勃地发展经济，并没有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所以，社会主义的苏联没有被卷入上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上次的一个景观，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卷进去了，受到危机的严重冲击。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第四季度更降为6.8%，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1%，使我国的经济遭受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与苏联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遇到的情况全然不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长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参加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地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影响。

我们多年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GDP的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的40%的空前高度，致使我国经济的相当大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这不能